

自媒体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守正创新

■ 周维明

自媒体以其内容广泛性、及时性、简短性等特点深受青年大学生的喜爱。与此同时,其信息多元化、表达浅表化、传播碎片化及算法推荐机制,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塑造、思维能力和认知习惯形成了深层影响,不仅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与理想信念教育,也使高校思政课教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思政教育需要在守正基础上实现创新,即坚定不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教学内容、途径与方式的范式变革,从而巩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一、自媒体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面临的挑战

(一)信息多元化对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

自媒体的兴起彻底打破了传统的信息发布与接收格局,各种社会思潮、价值观念乃至错误言论在社交网络、短视频平台中广泛传播。青年大学生正处于“三观”形成的关键阶段,其高阶思维与信息甄别能力尚在发展中,面对鱼龙混杂的信息环境,主流意识形态存在被边缘化、稀释化的风险,这对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直接挑战。一些错误思潮的持续渗透,对学生价值观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是消费主义思潮消解崇高理想追求。消费主义将人生意义窄化为对物质资源的占有,以“物”的获取替代对崇高精神与集体价值的追寻,消解崇高理想追求。这种思潮影响下,奋斗的目标不再是创造社会价值,而是积累个人消费资本。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异化劳动使人“同自己的类本质异化”,而在消费主义中,人的价值进一步被“物化”,人通过占有物来定义自身,丧失了

对生命意义的深层追问,理想信念丧失。二是功利主义思想导致教育主体性退化,“内卷”与“躺平”现象并存,消解了奋斗精神。当学习沦为获取物质资源的手段,其内在价值与精神愉悦便被遮蔽,学习的主体性消失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教育的本质在于“育人”而非“制器”。然而在功利主义导向下,学生易失去学习的主动性与完整性,沦为教育生产线上为适应某种职业需要的被动客体,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教育主体性退化与崇高理想的消解对意识形态教育形成严峻挑战。

(二)算法推荐塑造的“信息茧房”加剧思想偏狭

在自媒体世界中,学生基于兴趣点击和浏览信息和视频,表面上享有充分的选择自由。然而,基于用户行为的个性化推荐算法实质上限制了学生的选择,使学生只能在高度的个性化和定制化的内容中选择,这无形中构筑了一面墙把学生和真实世界隔离开来。算法推荐不断强化学生既有偏好,使学生长期沉浸于同质化内容之中,难以接触真实世界的全貌,陷入“信息茧房”。一方面,长期处于“信息茧房”会使学生陷入“偏听则暗”的困境,形成错误认知。例如,某些大概率事件在现实生活中易于辨识,但算法推荐将不同时空发生的类似事件持续推送(即便是发生概率在十万分之一的事件在不同时空内发生的数量也是非常可观的),给学生构造出扭曲的“样本空间”,让学生的认知观点不断被这个扭曲的“样本空间”验证,导致学生形成错误认知。另一方面,长期处于“信息茧房”,不仅会窄化学生的认知视野,更会固化和强化其既有偏见,甚至形成偏激观点。这一过程实质上是在无形中对青年认知结构进行非预期形

塑,与思政课教育引导学生全面、辩证、发展地看待问题的目标背道而驰。

(三)浅表化浏览催生“单向度”思维

在传统的书本阅读时代,读者掌握着阅读的主动权和节奏,可以随时停下掩卷思考,在停顿与思考中培育读者的概念判断、逻辑推演与批判思维能力。自媒体内容“短、平、快”的特质,迎合了青年学生碎片化学习习惯,但也助长了浅表化、感官化的信息接收模式。学生习惯于在数秒内被视觉刺激吸引,在几分钟内完成对一个复杂议题的“速览”。自媒体时代的这种浅表化浏览使阅读的主动权和节奏掌握在自媒体中,常以极快的语速向学生推送大量信息,不留给学生信息甄别、系统思考与整合整合的空间,只能被动地接受信息。长此以往,学生容易停留于被动接受信息,丧失反思、质疑与超越的批判性倾向,沦为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在表面的信息自由中丧失了真正的思维自主。

二、自媒体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对策

(一)推进“内容供给侧改革”,筑牢意识形态主阵地

思政课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并“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面对自媒体时代信息生态与学生认知习惯的双重变化,思政课教学需要守正创新,亟须对教学内容进行供给侧改革,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阐释力与竞争力。一方面,推动理论叙事向生活化、场景化转换。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宏大叙事,转化为贴合学生生活经验的微观故事与热点解析,实现理论内容的“具身化”理解。例如,通过讲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沧桑

巨变、脱贫攻坚、科技创新、“九三”阅兵等鲜活案例,引导学生感受“民族复兴”“共同富裕”“以人民为中心”等理念的现实生命力,在共情与反思中建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理论自觉,激发学生的自豪感和使命感,自觉把个人“小目标”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另一方面,借助动态知识图谱等技术构建智慧教学系统,将课程理论体系转变为适应自媒体时代碎片化学习的教学体系。将思政课程理论体系分解为若干个知识点,并将各知识点与历史事件、时政热点、生活案例进行语义关联,再按各知识点的内在逻辑将其联结成整体知识网络。使学生无论从哪个信息碎片切入,均可通过索引、链接和推荐回归理论系统,实现碎片化知识与体系化认知的统一。

(二)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破解算法“茧房”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鱼龙混杂信息多元的自媒体时代,培养学生理论思维更重要。自媒体时代的思政课,既要“授人以鱼”,重视理论灌输与价值塑造,更要“授人以渔”,着力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马克思主义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是培养学生理论思维的基础。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根基,培养学生信息甄别、逻辑推理与论证评估等批判性思维能力,使学生在复杂信息环境中保持独立思考。例如,可选取自媒体中具有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内容,引导学生剖析其立论依据与推理漏洞,识别虚假信息与逻辑陷阱;围绕社会热点,搜集不同立场自媒体的报道,组织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学会多角度审视问题,提升学生思维深度与社会洞察力,培养学生全面、发展、辩证地看问题,冲破“信息茧房”。

(三)构建平等对话教学,重塑学生主体性

自媒体推动的去中心化传播,对教师传统权威构成一定挑战,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授课模式难以奏效。教师角色应从“知识权威”转向“学习引导者”与“对话协作者”,实施平等对话教学,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通过创设问题情境、设置认知冲突、引入典型错误观点等方式,鼓励学生提出问题、自由发表看法、展开辩论,并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讨论问题。在学生的争论中,教师不是知识传授者,不直接给予学生答案,而是引导学生审视争论焦点、澄清基本概念、检查主要论据、审视推理逻辑,并根据争论内容为学生指明需进一步阅读的经典文献,从而将争论转变为共同探究真理的协作过程。在此对话中推动学生深入思考、重建理解、优化认知结构、夯实理论基础,真正实现教师主导性与学生主体性的有机统一。

三、结语

自媒体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面临严峻挑战,须坚守正道、勇于创新。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强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的根本前提下,积极创新教学模式与方法,将深邃的理论与现实情景相结合,通过教学内容供给侧改革、批判性思维培育与平等对话教学机制构建,切实提升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与亲和力,实现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相统一,不断筑牢高校意识形态阵地,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作者单位:遵义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路径

■ 王文君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创新形态,为破解乡村产业发展难题、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通过探索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路径,旨在构建绿色、高效、创新的乡村产业体系,推动乡村经济实现质的飞跃,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一、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产业振兴的理论基础

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核心要义,以绿色低碳为发展导向,能够为乡村生态现代化建设、乡村产业生态化转型以及乡村治理数字化升级提供强劲驱动力。作为具备高科技属性、高效能优势与高质量特征的先进生产力形态,新质生产力在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应用,将不断激活乡村发展的活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和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影响社会发展进步最为重要的因素,也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根本标准。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属于先进生产力的范畴,这一理论的问世,为农业领域抢抓发展新机、培育新兴业态、实现跨越式突破指明了必然路径。

新质生产力属于具有前瞻性的生产力形态,其赖以发展的新兴产业,具备知识与技术高度密集、科技附加值突出的鲜明特征。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要围绕地方特色产业,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开展乡村生产技术创新研究。要激发劳动、资本、土地与科技、人才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活力,借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生产要素发展的契机,围绕市场需求促进乡村资源高效流通。凭借数字技术优势,让乡村产品与乡村资源获得更充分的宣传推介。绿色、低碳、环保是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性要素。借助为乡村存量产业注入全新发展动能,助推其完成转型升级,催生出新新的产品类型与服务模

式,进而搭建起绿色低碳、循环高效的乡村经济架构。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共进,达成产业兴旺与乡村生态宜居的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二、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路径

(一)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要提升农业科技发展水平,需从资金投入与技术落地两大维度发力。一方面,扩大农业科技创新的资金供给,在既有农业科技研发企业的基础上增设专项扶持基金,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同时引导社会资本注入农业科技赛道,为技术研发筑牢资金保障。另一方面,强化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实效。技术的价值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提升上,各地需结合自身资源条件、经济实力和产业布局,针对性引进适配的农业技术,通过试点试验测算技术投入成本,兼顾技术的长效性与伦经济效益;同时完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开展专业化指导培训,提升农户对新技术的掌握和应用能力。

(二)强化乡村人才培育

人才是驱动乡村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要素,需构建层次分明、结构合理的培育体系,全方位激活各类人才创新潜能。其一,建强涉农科研人才梯队,紧扣农业科技趋势与产业升级需求,围绕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定向培育能突破技术瓶颈的科研骨干。其二,引育并重打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依托“田间学校”“送教下乡”培育懂技术、善经营的高素质新农人,通过“头雁计划”培育合作社带头人,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其三,厚植乡村企业家成长土壤,企业家在产业规划、技术创新、资源调配等方面作用突出,需引导政企协同发力,抢抓科技革命机遇,聚焦关键技术攻关与新兴产业培育。与此同时,涉农高

校作为科技、人才与创新的交汇点,需强化服务乡村产业能力。一方面优化学科布局,构建契合农业产业需求的学科体系,实现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另一方面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深化科技特派员、科技小院等制度,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乡村产业发展的现实生产力。

(三)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第一,搭建智能化物流信息平台。依托物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整合县域乡村物流资源,实时追踪运输车辆轨迹与货物状态,通过智能算法规划并动态调整配送路径,有效压缩物流运营成本。在山地、丘陵等交通薄弱区域,推广无人配送车、无人机等新型运载工具,助力农产品高效外运与小件快件精准投送,全面提升乡村物流配送效能。秉持数字化便民导向,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向乡村末梢延伸,实现涉农审批事项“一网通办”,以数据赋能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第二,规划建设乡村产业园区。按照产业类型进行分区布局,建设标准化厂房、仓储设施,配套完善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等设施,并融入绿色建筑技术和智能化管理系统。为入园企业提供优惠政策,吸引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开发、农业科技企业等入驻,形成产业集群效应。打造创新研发中心,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促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产业集群。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看,新质生产力为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它凭借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重塑农业全链条模式,打破城乡要素壁垒,以知识、技术等要素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丰富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助力共同富裕与民族复兴。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泥湾精神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路径探析

■ 李亚梅¹ 郑雅婷²

南泥湾精神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生产运动中,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必修课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承担着阐释历史规律、培育家国情怀的使命,其课程性质强调“历史性、理论性、教育性、政治性的统一”。将南泥湾精神有机融入《纲要》课程,既是深化历史认知与价值引领的内在要求,也是破解当前思政教育“重知识轻精神”困境的创新路径。基于南泥湾精神的历史特质与《纲要》课程的教学目标,探析二者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为新时代思政教育改革提供参考。

一、南泥湾精神的理论内核与课程融入的契合性

(一)南泥湾精神的历史生成与价值意蕴

南泥湾精神形成于 1941 年延安时期。面对国民党军事围困与经济封锁,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响应党中央号召,在荒芜的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通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实践,将“荆棘遍野、荒无人烟”之地变为“陕北的好江南”。这一运动不仅解决了根据地物资短缺问题,更孕育了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核心的精神体系。

其中,南泥湾精神深层价值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突破困境的实践智慧,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改造现实的能力;二是凝聚力量的团结品格,军民同心、官兵一致,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集体意志;三是面向未来的发展观,将生存斗争与长远建设结合,为革命胜利奠定物质与精神基础。

(二)《纲要》课程的教学目标与精神需求

《纲要》课程以“两个了解、四个选择”为核心目标,即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道路及改革开放的必然性。但当前《纲要》教学存在两大痛点:一方面,历史叙事碎片化,过度侧重事件梳理而弱化精神传承,导致学生难以形成历史纵深感悟;另一方面,价值引导抽象化,理论灌输多于情感共鸣,影响“四个选择”的内化认同。

而南泥湾精神恰好为破解此难题提供载体。首先,从历史维度讲,南泥湾精神诞生背景直接关联《纲要》中“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章节,可具象化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其次,从理论维度讲,“自力更生”理念呼应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鲜活案例;最后,从价值维度讲,奋斗精神与团结品格,正是“四个选择”历史必然性的微观印证。所以,二者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上高度契合,为深度融合奠定基础。

二、南泥湾精神融入《纲要》课程的现实困境

南泥湾精神融入《纲要》课程能够系统地促进教学,对教学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但在当前实践层面,仍面临制约。

(一)内容融入的表层化

在授课中,多数教学仅将南泥湾作为“大生产运动”的单一案例,停留于“三五九旅开荒种地”的史实复述,未能深入挖掘其精神内核与课程章节的关联性。例如,在“解放战争”章节中,可关联南泥湾精神对土地改革中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激发;在“社会主义建设”章节,可对比其与“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的传承关系,而这些都未进行系统整合,使得表层化融入导致精神价值被稀释,沦为“历史点缀”而非“思想主线”。

(二)方法创新的滞后性

传统教学以课堂讲授为主,缺乏体验式、互动式设计。南泥湾精神的实践性本质要求“做中学”,但现有模式多依赖图片展示或纪录片播放,部分学生难以通过亲身参与理解“艰苦创业”的艰辛与成就。红色资源需要“从静态保护转向动态传承”,而当前《纲要》课程对南泥湾

相关遗址、劳模故事等资源的利用仍显不足。

(三)评价体系的单一化

在课程考核中,比重更加侧重于知识记忆,缺乏对精神内化程度的评估。学生可能熟练背诵南泥湾精神的定义,却无法将其与当代青年责任关联。授课的目标是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引领”三位一体,但现有评价体系尚未建立精神素养的量化指标。

三、南泥湾精神融入《纲要》课程的实践路径

南泥湾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纲要》课程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历史思维,必须要创新实践路径。

(一)重构教学内容,构建“三维四阶”教学体系

一方面,要将南泥湾精神嵌入《纲要》课程的知识、能力、价值维度中,充实教学内容。从知识维度上,在“抗日战争”章节增设“南泥湾大生产与根据地建设”专题,分析其持久抗战战略的支撑作用;在“改革开放”章节对比“南泥湾”实践,凸显精神传承;从能力维度上,要学会设计“历史情境推演”任务,如“若三五九旅未开展南泥湾开荒,根据地可能面临何种危机?”,以此培养学生历史辩证思维;从价值维度上,提炼“自力更生”与新时代科技自立自强、“团结奋斗”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联,强化精神的时代投射。

另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按“认知—体验—反思—践行”将南泥湾精神推进。首先,通过文献研读、档案分析,建立史实基础,认识南泥湾精神;其次,利用 VR 技术还原南泥湾劳动场景,或组织“校园微垦荒”实践,模拟互助协作,体验南泥湾精神;再次,开展“南泥湾精神与我的专业”主题辩论,如探讨“现代农业中的‘自力更生’”,反思南泥湾精神;最后,鼓励学生调研家乡“新时代南泥湾式”案例,形成实践报告,用行动践行南泥湾精神。

(二)创新教学方法,打造“虚实结合”教学场景

“虚实结合”教学场景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一是建设线下实践基地。与延安南泥湾革命旧址、地方农垦博物馆合作,建立《纲要》课程实践教学点。通过“现场教学+劳动体验”模式,使学生在汗水中体悟“艰苦创业”。二是开发线上数字资源,构建“南泥湾精神数字资源库”,包含史料库,如三五九旅战士日记、大生产运动影像、劳模口述史;案例库,如新时代传承案例;建立互动平台,开发“南泥湾决策模拟”游戏,让学生扮演指挥员分配资源、应对危机,深化对“自力更生”策略的理解。三是跨学科协同教学,联合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系、农学院开展专题授课,共同阐释“从南泥湾到智慧农业”的科技自强之路。

(三)改革评价体系,建立“多元立体”考核机制

《纲要》课程的评价体系与其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评价体系相似性大,以至于难以吸引学生。对此,必须要改革《纲要》评价体系。

首先,要注重改革过程性评价,应将课堂参与(如情境推演贡献度)、实践报告(如垦荒体验反思)、小组协作(如互助组模拟表现)等开放性教学纳入考核,占比不低于 40%。

其次,改革成果性评价。在知识层面,通过用案例分析题替代名词解释;在精神层面,采用“成长档案袋”记录学生从认识到践行的转变,让学生提交“我的自力更生计划”;在增值性评价层面,通过前后测对学习态度同度变化,前测聚焦“对南泥湾精神的了解程度”,后测侧重“该精神对个人成长的影响”,量化融入效果。

基金项目:西安翻译学院科研项目“南泥湾精神融入‘纲要’课程教学的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25B79)。

(作者单位:1.西安翻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2.西安翻译学院英文学院)

敦煌本《汉书萧望之传》残卷研究

■ 高晓敏

敦煌写本文献中有两个版本的《汉书萧望之传》,一是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 P.2485,另一是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的 S.2053。二者均为残卷,但内容有重合部分,S.2053 完全包含了 P.2485 的全部内容。对敦煌《汉书》写本的研究,前贤已有诸多发现和整理。然而,在具体的传记研究中,对于敦煌写本文献《汉书萧望之传》只是略有提及,应当关注到 P.2485 和 S.2053 在内容上的共同之处以及写本面貌呈现出来的信息,利用这些信息可以推测写本完整的面貌,进而把握写本在生成过程中的流动性。

一、P.2485 和 S.2053 写本叙录

P.2485 和 S.2053 均为纸本,卷轴装,总体呈米黄色,质地均匀。P.2485 由三纸粘合成,前后有脱叶。上下边和第三纸都有明显的水渍,第三纸局部有破损,且沾染些许墨渍,涂有雄黄。先粘后写,现存密格,一纸长 43.4-43.7 厘米,第三纸左侧粘贴有第四纸极窄侧边,全长 27.3-27.9*131.1 厘米。

S.2053 由十四张完整的纸加前后两张裁剪过的纸粘合成,首叶存三分之一纸,末叶存四分之一纸,共十六张纸,前后有脱叶,第一纸下边,第二纸右边,第十五纸下部、第十六纸上下部均有局部破损,先粘后写。

二、P.2485 和 S.2053 重叠内容对校

从篇幅上来看,S.2053 号写本由于纸张存留更多,书写了更多的内容,包含更多的情节,从萧望之任左冯翊开始到望之自杀,后传其三子,全文结束。其中第十一纸末两行(P.205 行)至第十四纸前两行(P.248 行)包含了 P.2485 号写本中 57 行的全部《汉书萧望之传》

的内容,从“其歆望之罪”到“育过扶风府门,官属掾史百人拜谒车下”,描述的萧望之被构陷自杀、其子萧育任职司隶校尉前的仕途经历,大概是一段完整的情节。除每行字数和每张纸的毛丝栏数、残卷存纸数量影响了两个写本的面貌,注释的不同也是重要因素。S.2053 与 P.2485 重叠部分内容中,P.2485 出现了 22 处师古注,1 处服虔注,S.2053 只出现了 1 处师古注,必然造成文本篇幅上的差异。P.2485 出现的 23 处注文,与现今通行的《汉书补注》能够一一对应,当是较 S.2053 更为完整的《汉书》注本,S.2053 则在注文内容上有所省略。

三、P.2485 和 S.2053 写本原貌推测

P.2485 的抄写者在抄写之初一定经过认真的规划、量度,方能形成这样一篇规整、美观的抄本,格式的严谨也体现出抄写者对待该写本的审慎态度。

P.2485 残卷正文 674 字,与通行本相符合,约占《萧望之传》全文字数的 12.73%,根据前后所缺内容及残卷特征,原卷应有约 24 张纸左右,P.2485 残卷位于第 18、19、20 纸的位置。P.2485 原卷长度约 131.1 厘米。

P.2485 卷背为七言藏经,共 49 行,是一篇首尾俱全的藏经,可见 P.2485 号卷子被人分为开以后是以《大菩萨藏经》作为主要内容而存在的,而原本正面书写的《汉书萧望之传》的使用价值或者说存在价值就下降了,却并非毫无意义,可以说是作为一种陪衬而存在。

S.2053 正面卷首前有脱叶,显而易见,其残卷约占《萧望之传》全文字数的 85.16%,则其前至少脱 2 纸半至 3 纸。且根据魏迎春、郑炳林《敦煌写本李若立〈簾金〉残卷研究——

以 S.2053v 号为中心的探讨》:“敦煌写本 S.2053v《簾金》抄本残卷,首尾俱残,仅保存有驾幸篇第八十一叙文内容、刺史篇第廿二、别驾司马篇录事和叙文前半部分。”“尾残”说明卷背末尾有脱叶,同样证明了 S.2053 正面卷首前有脱叶。

如此看来,正面卷末是否还有脱叶不能确定,因为到“汉书七十八”《汉书萧望之传》已经完全结束,《汉书萧望之传》后是否还有下一篇目难以判断,需要结合背面内容判断末端脱叶情况。

S.2053 卷背包括两种文本,一是徐邈《礼记音》(乐记第十九 杂记上第廿至续编第卅三),二是李若立《簾金》。根据写本内容来看,《礼记音》《簾金》均是首尾俱残,许建平《唐写本〈礼记音〉考》:“据《经典释文·叙录》,撰《礼记音》者都十五家。然今仅零星散见于《释文》等书之引用,原书之面貌,已无一见。所幸敦煌写卷重现寰宇,中有唐写本《礼记音》残卷(S.2053),存《乐记》第十九至《缙衣》第三十二,凡八百八十行。《乐记》篇前阙,首五行损阙严重,……写本前后残缺,无著者姓氏。”S.2053 卷背首卷的《礼记音》首残,背面首残说明前有脱叶,脱的正是《汉书萧望之传》卷末脱叶背面书写的内容,则 S.2053 号正面不止书写《汉书萧望之传》一篇传,“汉书七十八”之后应有其他内容。

敦煌所见唐写本《汉书萧望之传》无疑为唐五代时期《汉书》在敦煌地区的流传、学习状况提供了补遗之门径。通过残卷推演写本的原始面貌,有助于把握写本在时间上的流动性,为还原写本原貌作出贡献。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